



李泽厚

启蒙与救亡作为中国和现代思想史的一个双重主题，相辅相成。经过戊戌、辛亥之后，五四主要人物把重点放在启蒙、文化上，认为只有革新文化，打倒旧道德旧文学，才能救中国。但中国现代历史的客观逻辑（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终于使文化启

蒙先是从属于救亡，后是完全为救亡所压倒，因为其他的课题和任务都得服从有关民族生死存亡的主题与启蒙和救亡并存的还有另一个双重主题，这便是民族心态方面的理性与激情的错综交织，它作为五四的另一个特征，影响也十分久远。

启蒙应以理性为导向和标志。五四曾以常识层次的理性审视一切，来打破迷信、否定盲从、解除精神枷锁、提倡“科学的人生观”；另一方面，无论是文化运动的启蒙先驱，还是广大学生的爱国活动，都洋溢着冲破重重网罗的激情。如果理性引导人们去思索去认识，那么热情则引导人们去否定去行动。热情与理性在当时的结合，发出轰然巨响的意识形态的冲击波，这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

这批判曾经是理性的，它分析论证了千百年来封建传统的虚伪、残暴等种种祸害；这批判更是激情的，它宣泄了巨大的愤恨。两个方面比较起来以激情为多。这不但使所谓“好就一切都好，坏就一切都坏”的思维模式风行一时，而且也造成先是笼统否定中国古代传统，后是笼统否定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使得我们所追求的理想成了一种割断传统的、空悬着的乌托邦。

因此，我认为，今天要继承五四精神，应特别注意发扬光大其理性、科学精神，特别是要研究如何使民主取得理性的、科学的体现，即如何寓科学精神于民主之中。这便是时代所需要的一种建设的理性和理性的建设，而不只是激情和否定。●

五四新文化运动敢于根本抛弃华夏中心主义，彻底砸烂自我封闭的思想体系；五四人物敢于充分发挥主体作用，敢于直指神圣传统，以天下为己任，敞开胸怀吸收西方文化，这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但在对待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这个问题上，五四人物也有其局限性。

所谓传统，严格说来可以分解出两层意思，即“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传统文化指过去发生而今流传下来的具体文化现象，它们或许只有欣赏价值和认识价值，或许仍在规范着今人的思想和行动；但无论怎样，传统文化已是明日黄花，是外在于今人的东西或力量了。文化传统则不然，它是内在于今人生活和心理中的东西，是支配着整个民族精神的东西。

五四时代既不能分辨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不同，更常把传统与现代化简单对立起来：保守者误以为现代化便是要抛弃一切传统，而如丧考妣；激进者则坚信传统与现

更重要的是发掘和重视文学本身的真和美的价值。过去以温柔敦厚为诗教，对文学作品的评价一向偏重于道德伦理等的教化作用；“五四”时期则更着重发扬文学作品的真实和审美的特性，从文学的本质特性、从审美的角度，重新评价过

## 论“五四”人物的局限性

庞朴

代化水火不容，而放言决裂。只有李大钊，提倡传统和现代、旧和新为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在我看来，所谓现代化，正是传统本身的现代化，现代化或由传统中生（如西欧），或赖于传统的转化（如东方），绝非天外之物。传统之与现代，不是机械地保存或决裂关系，舍弃哪些，保留哪些，并非仅仅依据西方文化坐标便可划定。五四人物反对封建的纲常名教，是立下历史功勋的，但由此波及汉字当废，便未免舍弃过多。五四人物大力提倡科学，今人皆身受其福，但由此论定中医当除，便缺少求是精神，五四人物改良文学艺术，是有口皆碑的，但由此诅咒

去的文学作品。

据以上考察可知，“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学的“重新估定价值”，绝不是简单粗暴的“全盘否定”传统，而恰恰是用现代的科学观点与方法，对传统文学进行再认识、再估价与再发现，使之在新

京剧当死，便未免强加于人。五四人物推行公元公历，是利于中外交流的；但由此力主端午、中秋节当禁，便有点情趣索然。至于涉及文化传统，也就是他们当时称之为国民性的，其笼统和激烈则更甚。如果真象他们说的那样，具有如此国民性或文化传统的民族，看来只有被开除人籍一途了。

五四人物在传统与现代化问题上的根本理论弱点，即在于他们误以西方人的行为方式为人的普遍行为，误以为西方人的习性为人的普遍本性。将其崇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五四精神是批判精神；五四打倒了传统偶像，我们绝不可再把五四奉为偶像传统。●

文学的变革中获得新的生命力，从而有助于推动社会的现代化。历史证明，本世纪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科学整理研究作出最卓越的贡献者，恰恰是高举“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旗帜的那一代人。●